

北京市老龄人口的婚姻状况

顾 鉴 塘

婚姻是制约人口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姻状况的各项指标,如未婚、初婚、再婚、丧偶、离婚、婚龄等的变化,无不影响到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等方面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妇女生育模式变化时,首先考察她们婚姻状况的变化,并非偶然。

本文拟据1987年中进行的2.15%北京市老龄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就全市老龄人口的婚姻状况作一初步分析。

一、未婚人数和不婚率

在所调查的2 003名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城镇1 147名,其中男566名,女581名;农村856名,其中男388名,女468名),终身未婚者只有13人,其中妇女仅2人(表1)。

表1 北京市老龄未婚人数和不婚率

年龄组	出生年份	调 查 人 数				未 婚 人 数				不 婚 率 (%)			
		城 镇		农 村		城 镇		农 村		城 镇		农 村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60—64	1927—1923年	209	238	114	144	—	2	3	—	0	0.84	2.63	0
65—69	1922—1918年	169	144	108	117	—	—	3	—	0	0	2.78	0
70—74	1917—1913年	98	95	87	100	1	—	3	—	1.02	0	3.45	0
75及以上	1912年及以前	90	104	79	107	—	—	1	—	0	0	1.27	0

资料来源: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等《北京市老龄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7年(以下各表资料来源均同)。

由表1可以看出,北京市历代老龄妇女终身不婚的比例极低,其中农村四个年龄组妇女全部已婚,不婚率为零;城市妇女中,仅1923—1927年出生的妇女存在不婚现象,但不婚率也仅为0.8%,1923年前出生的城市妇女,同农村妇女一样,全部为已婚。以上情况与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相似。如印度和伊朗,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终身不婚率不到1%。相比之下,欧洲型婚姻如爱尔兰,70年代初妇女49岁

(上接第18页)效,适应改革和开放的需要。

第三,征收“城市增容费”。为了解决武汉市市区新增人口费用问题,协调城市基础生活服务设施和人民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市政府除了增加一部分投资以外,要求对迁入人口征收一定数量的“城市增容费”,目前已开始实行,进入城区为1.2万元,进入城郊的收8千元,部分特殊人员可以减免。

第四,为市内人才合理流动提供优惠条件。市政府为了鼓励人口迁出,创造人才合理流动的良好环境,对从本市迁出的人口,尤其是大专院校毕业生愿去郊县或小城镇工作的,在工资福利、住房、晋升职称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实行灵活多样的优惠政策。例如“保留全民所有制的干部身份”,“工作满6年后可以自由流动”,“所在企业停产倒闭,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另行安排工作”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减少人们的“恐迁”心理有一定的稳定作用。(本文责任编辑:徐莉)

(作者工作单位:黄红云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陈贤寿 武汉市统计局)

不婚的比例虽比过去有较大下降,但仍达18%。芬兰70年代后期的相应比例为11%。

北京市老龄男性未婚的情况与妇女存在较大差别,不婚率摆动在1—3.5%之间。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城镇男子不婚率很低,农村男子不婚率相对较高。总的说来,北京市农村男子终身不婚的比例与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接近,甚至低于伊拉克、斯里兰卡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后者在4—7%之间。

北京市老龄人口终身不婚率低,尤其是妇女,几乎接近于零,反映了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与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人所皆知的事实是,在我国,大龄男女不婚会招致非议,于妇女则尤甚,故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男女,尤其是妇女的完婚率是极高的,这也可以说是以往我国妇女生育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次调查还提供了终身不婚者的文化程度和原职业情况。农村的10名不婚男性中,除2名为小学文化外,其他8名为文盲和半文盲。这一现象颇具意义,说明即使在过去,文化程度低的男性在择偶上也存在某种困难,而文化程度与职业层次均低的男性,择偶的困难性要更大些。

二、初婚比例

我国在1949年解放之前没有法定的结婚年龄,民间盛行早婚习俗。这次调查的60岁以上组老龄人口均在解放前经历了他们的最低可婚年龄。因此,15岁以下初婚者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尤以农村人口为甚。农村人口中,又以妇女为高(表2)。

表2 北京市老龄人口年龄组别初婚比例 (%)

初婚年龄	城 镇								农 村							
	60—64		65—69		70—74		75及以上		60—64		65—69		70—74		75及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5以下	1.91	4.24	1.18	2.78	2.06	2.11	2.22	1.92	1.80	8.33	7.62	1.71	4.76	8.00	5.13	3.74
15—19	19.62	43.32	28.40	47.22	20.62	47.37	30.00	52.88	48.65	75.00	36.19	76.92	38.10	66.00	43.59	77.57
20—24	33.49	36.44	29.59	27.08	28.87	31.58	28.89	30.77	31.53	12.50	32.38	18.80	32.14	24.00	29.49	12.15
25—29	27.75	13.56	22.49	18.75	23.71	16.84	21.11	10.58	10.81	4.17	16.19	2.56	16.67	1.00	11.54	4.67
30—34	12.92	1.27	13.61	4.17	16.49	1.05	10.00	1.92	6.37	—	4.76	—	5.95	1.00	7.69	0.93
35及以上	4.31	1.27	4.73	—	8.25	1.05	7.78	1.92	0.90	—	2.86	—	2.38	—	2.56	0.93

表2所表明的是全市城镇老龄人口1 144人,农村老龄人口846人(合计1 990人)按男女分成四个年龄组所计算的初婚比例,或者说分年龄组的初婚率情况。这里,由于资料所限,未能将初婚年龄进一步再细分,尽管如此,表中数字仍能反映出不同年龄组老龄人口初婚年龄分布情况。

首先,无论城乡,四个年龄组的老龄人口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15岁之前已经结婚,城镇男性结婚比例在1.2—2.2%之间,女性在1.9—4.2%之间;农村男性结婚比例在1.8—7.6%之间;女性在1.7—8.3%之间。这些数字说明了解放前早婚、甚至童婚陋习的流行程度。

其次,进入15—19岁组后,结婚比例迅速增长。四组人口中,有三组以15—19岁为其结婚峰值年龄段。其中城镇女性与农村男性在此年龄段的结婚比例比较接近,城镇女性甚至还略高于农村男性。其总体人口在此年龄段结婚的已占半数左右。至于农村女性,在此年龄段结婚的已占人口总数的66—77.6%,数量之集中,自非其他几组人口可以相比。唯一例外的是城镇男性人口,在此年龄段结婚的仅占人口总数1/5强。从而说明了解放前北京城镇男性人口在初婚模式上的特殊性。

第三,结婚峰值年龄段过后,初婚比例开始下降,下降最快的是农村女性人口组。到24岁左右,已降到相当低的水平,说明当时95%以上的农村妇女在24岁之前均已完婚。相比之下,其余三组人口的初婚比例下降得较为平稳,其中城市女性24岁后未婚的尚占14.4—22.9%,农村男性则占到18—25%。至于城镇男性人口,初婚峰值年龄段虽在20—24岁组,但其比例较其它三组人口的相应峰值要低许多;同时,与其自身

前后两个年龄组初婚比例相比，亦相差不多，说明由于该组初婚年龄分布较为均匀，故其较为集中的初婚年龄实际上是以20—24岁组为中心而向前后铺开的。与农村男性人口组相比，城镇男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事实上要高整整一个年龄组。

早婚是亚洲和非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以上四组人口初婚比例的分布具有典型意义。四组人口自身的四个年龄组在初婚年龄段上的比例是十分接近的。这正好说明，解放前，支配人们婚姻行为的基本社会经济条件和传统生活习惯长期以来变化不大。这也正是过去旧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胎次间隔密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到了解放后，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根本变革，传统生活习惯的慢慢变化，人口的传统婚姻模式才开始起变化。这一点，已为国内的一些调查所证实。

调查还记录了不同文化程度者的初婚年龄情况。总的趋向是：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初婚年龄的高低成正向运动，亦即文化程度高的较之文化程度低的初婚年龄要高。以城镇男性人口为例，具有大学、中专文化程度者较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峰值初婚年龄要整整推迟一个年龄组。此外，15—19岁组结婚者，大学、中专所占比例很低，初中以下文化者所占比重则很高。后者甚至在15岁以前结婚者中还占一定比例，而前者在30—34岁组结婚者甚至还占到25%以上。城镇男性高中文化者初婚情况与初中以下文化者比例相似，不同的是在25—29岁组，初婚者占到30%左右，与大学、中专文化者接近，而与初中文化以下者相去较远。另一方面，文盲、半文盲人口35岁以上初婚者所占比例却高于大学文化程度，说明这部分人口因文化过低给成婚带来的困难。文化程度与婚龄的关系在城镇女性人口中也表现得十分典型：大学文化者初婚峰值年龄在25—29岁组，中专、高中与初中文化者初婚峰值前移至20—24岁组，小学以下者初婚峰值又前移至15—19岁组，而且初婚峰比例格外集中，其中又以文盲所占比例最高。

三、有偶、丧偶、离婚与婚次

老年有偶，子孝媳贤，是中国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的一个标志。从调查情况看，1987年北京城镇男性有偶比是较高的（表3）。以60—64岁组为例，该组有偶比较之1982年普查时城镇50—59岁组男性有偶比仅低不到1个百分点，同时大大高于1956年时各年龄组的相应比重^①。相比之下，该龄组女性有偶比显得偏低，与1982年普查资料50—59岁组的有偶比相差达9.39个百分点^②。其主要原因，只能用从该龄组起男性人口死亡率渐高来解释。尽管如此，1987年60—64岁组女性人口有偶比仍高于1956年50—59岁组女性人口有偶比水平，后者为75.20%^③。反映了30年间全市城镇男性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事实。说明1987年城镇男性人口有偶比较高的另一点是有偶比下降的速度低，60岁组起至74岁组止，年均下降速度仅为0.85%，只是从75岁组起，有偶比才有明显下降，但75岁组城镇男性人口的有偶比仍保持在67.8%的较高水准上。

表3 北京市老龄人口有偶、丧偶及分居离婚比例 (%)

年 龄 组	有 偶 比				丧 偶 比				分 居 离 婚 比			
	城 镇		农 村		城 镇		农 村		城 镇		农 村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60—64	94.26	77.73	80.70	75.69	4.31	20.17	14.91	23.61	1.44	1.26	1.75	0.69
65—69	89.35	61.11	75.00	57.26	8.88	36.11	19.44	38.46	1.78	2.78	2.78	4.27
70—74	83.67	48.42	68.97	35.00	12.24	49.47	26.44	63.00	3.06	2.11	1.15	2.00
75及以上	67.78	17.31	53.16	26.17	31.11	79.81	45.57	72.90	1.11	2.88	—	0.93

比较之下，北京农村男性有偶比相应要低些。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其本身有偶比的下降速度相对要快些，如1982年时北京郊县50—59岁组男性人口有偶比为87.56%，1987年时60—64岁组有偶比降为80.70%，下降近7个百分点。60岁组起至74岁组，有偶比下降的年均速度也达到1.13%，超过城镇的相应

①②③ 见《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第299、295页。

速度。二是从有偶比地区构成看,一般而言,农村地区有偶比总是低于城镇,从北京城乡比较看,两地男性人口有偶比的相差就十分明显。这显然与城乡不同的健康卫生条件相关。

至于女性有偶比,在通常情况下总是低于男性。这与男性平均寿命低于女性是相一致的。从表3情况看,北京城乡女性有偶比相差不如男性明显,但在75岁以上高龄组,农村女性有偶比甚至超过城市8.86个百分点,说明北京农村高龄组的妇女,夫妇双全的比例要高于城镇。

与有偶情况密切相关的是丧偶及丧偶比。也就是说,在当今北京市各老龄年龄组中,有偶比高者,丧偶比必然低;反之,则丧偶比必然高。这是因为:(1)整个男女老龄人口的不婚率很低;(2)老龄人口中的分居和离婚比例很低。关于后一点,如调查资料所表明的,城乡全部男女各年龄组,分居与离婚的比例合计仅占1.85%(分居1.25%,离婚0.60%),故对老龄人口整个婚姻情况的影响不大,同时也说明了全市老龄人口的婚姻家庭情况是很稳定的。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却不容忽视,即老龄人口分居离婚与丧偶合计的比例总是很高的,而且随着年龄组的增高这一比例亦随之大幅度上升。这就向社会提出了问题:应当如何不仅从物质上,而且更主要从精神上关心那些失去伴侣的老人?如何使随年龄组增高而比重增多的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能更有保障更加幸福?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何消除阻碍老人再婚的阻力(这种阻力可能来自几个方面,诸如来自老人自身的旧传统旧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子女的阻挠等),以使许多有再婚愿望的迟暮之人能重结伉俪,安度晚年?

问题还在于,首都老龄化的步伐十分强劲,数年前开始的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已使得全市在1987年,即比原来预测的提前三年开始步入老年化社会。至200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近15%。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增大,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60岁及以上老人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根据此次抽样调查计算得出的老龄人口分居离婚丧偶比来估算,至2000年全市城乡160万60岁以上老人中^①,男性分居离婚丧偶者将达近14万,女性将达37.6万,合计约51.6万(160万的老人性别构成亦以此次调查的男占47.63%,女占52.37%估算);至2020年全市城乡269万60岁以上老人中^②,男性分居离婚丧偶者将达23.8万,女性分居离婚丧偶者将达63.3万,合计约87.1万。以上庞大的人口数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在思想、精神和物质方面着手准备,不失时机地妥善解决包括老年人抚养和晚年生活安排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最后,分析一下北京市老龄人口的婚次。婚次与离婚丧偶直接相关。就世界范围而言,发达国家人群中婚次的增加主要是离婚率高引起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因中年丧偶较为普遍而使得婚次增加。就我国而言,解放后,由于人民健康水平提高较快,中年人口的丧偶率并不高。据笔者过去对北京城近郊区50—80年代初的回顾调查,再婚原因均以离婚为主,丧偶为次。再婚者的高峰年龄组则以35岁以下者居多,从性别看,再婚者中男子比重始终要超过女子^③。以上结果也说明了北京城近郊区在老年人丧偶率增高情况下再婚率处于较低水平以及妇女婚次低于男子的基本事实。

对此次抽样调查资料的计算表明,全市城镇老年人口中,男性的平均婚次为1.24次,妇女为1.10次;男性再婚一次的(婚次为2)占19.64%,女性占10.01%;男性再婚二次的(婚次为3)占2.12%,女性占0.17%,个别男性还有再婚三次的(婚次为4),占0.09%。农村情况与城镇有所不同,其中男性平均婚次为1.12次,女性为1.14次。农村女性再婚一次和二次的比重均超过男性,前者分别为11.75%和1.07%,后者则为10.58%和0.79%。以上情况说明,城镇老龄男性平均婚次要高于农村男性,农村老龄妇女平均婚次要高于城镇妇女。城镇老龄男性平均婚次高于城镇老龄妇女,以及农村老龄妇女平均婚次高于农村老龄男性,是与长期以来北京城镇男性再婚可能性高于城镇女性,农村妇女再婚可能性高于农村男性这一基本事实完全一致的。

资料还说明,婚次与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有关。我根据调查材料,将大学文化归为高等文化程度,中专、高中和初中文化归为中等文化程度,小学、识字不多和不识字归为低等文化程度;将月均收

^{①②}、老人数均据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未来50年人口预测”。

^③ 详见《中国人口年鉴》198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07—508页。

(下转第13页)

(四) 节约用粮和控制粮食消费。解决人粮关系，光抓粮食生产和流通不行，还要抓粮食消费。影响粮食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除了人口数量增长外，很重要的是人们收入的增加。最近几年，我国粮食消费增长中，因收入增加而引起的肉食和酒类等用粮的增长速度更快。以1986年为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口粮，比1984年增加1.85%。而人均消费的肉、禽、蛋增长6.72%，人均消费的酒类增长38.05%。1986年全社会粮食消费增加的150亿公斤总量中，只有52.5亿公斤用于口粮增长，而有95亿公斤用于居民收入提高后肉食和酒类增长的粮食消费。今后在正常年景下，粮食每年可达到1.5—2%的增长率，这仅能满足因人口增长而增加的口粮需要，无法满足每年近100亿公斤的增加畜产品和饮料酒生产的用粮需要。同时，目前粮食消费中还有相当严重的浪费现象。根据这些情况，必须大力提倡节约粮食和控制用于改善生活的转化粮。即使是将来粮食多了，也要强调节约和控制用粮。

粮食增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本世纪末，使粮食总产量提高到5 000亿公斤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400公斤（按总人口12.5亿计算），是可以达到的。这以后情况一定会更好些。所以，我们应当有信心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和粮食关系协调发展。（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上接第22页） 入15元以下—45元者为低收入，46—100元者为中收入，101—201元者为高收入，制成城镇、农村老龄人口按文化程度与月均收入的平均婚次数据表（见表4、表5）。

表4 北京市老龄人口按文化程度的平均婚次

文化程度	城 镇		农 村 (男女合计)
	男	女	
高 等	1.19	1.10	—
中 等	1.28	1.06	1.35
低 等	1.25	1.12	1.13
合 计	1.24	1.10	1.13

表5 北京市老龄人口按月均收入的平均婚次

月均收入	城 镇		农 村 (男女合计)
	男	女	
上 等	1.23	1.13	1.04
中 等	1.25	1.08	1.09
下 等	1.37	1.10	1.14
合 计	1.24	1.10	1.13

表4、表5中的婚次数据反映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现象：从城镇老龄男性文化程度与平均婚次的关系看，中等文化者婚次最高，低等文化者次之，高等文化者最低。这大约与我国男性高等文化者离婚、丧偶率相对较低，家庭比较稳定，中等文化者离婚丧偶后再婚较易以及男性低等文化者再婚率相对较低有关；城镇女性文化低者婚次最高，则说明了城镇低文化层次女性离婚、丧偶率以及再婚率相对较高的事实。从农村情况看，中等文化层次者婚次显著高于低等文化者，大约也与前者离婚丧偶后再婚较后者容易，故再婚率较后者高有关。

从月均收入与婚次关系看，无论城乡，大体均为收入低者婚次高，收入高者婚次低，反映了不同收入层次家庭稳定程度的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文化、经济收入与婚次高低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这是因为，第一，有些类别的样本量较小，如农村和城镇妇女中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样本数就不一定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文化层次与婚次间的关系；第二，目前存在着的低文化者与高文化者、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工资倒挂的现象妨碍了在较为客观的基础上将文化、收入与婚次关系作尽可能如实的分析。可以期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工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对包括文化、经济收入与婚次关系在内的问题将能作出进一步的揭示与说明。（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